

陶渊明散文艺术浅论

李伯齐

古代许多文学大家，都是诗文兼长的，陶渊明也不例外。他的诗歌，历代评论几无异词，公认为我国中古诗坛的杰作。而对其散文的艺术成就，相对而言，就略嫌论述不足。其实，他的散文，如同他的诗歌卓立于晋宋之际的诗坛一样，是我国古代文苑中一朵馨香独具的奇葩。

一

鲁迅先生曾说：“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，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。”（《而已集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并从文学创作与政治生活、社会风气的关系方面，指出汉末魏初的文章的特点，是“清峻，通脱，华丽，壮大”，而“师心”和“使气”“便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”。“再至晋末，乱也看惯了，篡也看惯了，文章便和平。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。”（同上）

鲁迅以“平和”二字，来概括陶文的特色，显然是相对于孔融和嵇康文章的激烈而言的。在同一篇文章中，鲁迅曾指出：“陶潜之在晋末，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。”他们同处于末世，因各种原因，他们所取的政治态度不同，所走的人生道路也就不同。孔融反对曹操，常以文章对曹氏父子冷嘲热讽；嵇康则刚肠嫉恶，激烈反对司马氏，文章时露思想锋芒；他们最后都被杀害。陶渊明与他们不同。“如彼稷契，孰不愿之？”（《读史述九章》）他本来是有一番政治抱负的，但看到政治黑暗，欲有为而不能，便辞官归隐了。在政治上采取这种退避态度，自然是消极的，但陶渊明的退隐，与一般失意文人消极颓废者不同，也与悠游世外、皈依佛道者大异其趣，他是以退隐表示对黑暗时政的反抗，是表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。因此，他对人生是执着的，严肃的；对生活是热爱的，对时政是关心的。唯其如此，他在自然纯朴的农村生活中，寻求到了快乐，得到了慰藉；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他仍然积极进行探索、追求。但在网密鱼骇、罗宏鸟惊的黑暗时代，为远祸避害，即便涉及社会现实而寄寓愤慨的诗文，也常常出语平淡，即鲁迅所谓的“平和”。而出语平淡，寄意深远，则是陶渊明散文的艺术特色。

二

陶渊明的散文，是诗人之文，以抒情言志为主。如同后来刘勰论述为文之道时所指出的那样，是“为情而造文”，而非“为文而造情”（见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），因而情采相生，辞理并胜。就内容而言，他的散文可分为四类：一是述志为主的抒情文，《桃花源记》、《五柳先生传》即是；二是以抒情为主的哀祭文；三是以叙事纪实为主的传疏文；四是史评赞述文等。而最能代表陶渊明散文艺术成就的，是述志为主的抒情文。

《五柳先生传》是一篇仅有一百七十四字的小短文，但却生动地描画了一个传之千古的

“五柳先生”的形象：他远离恶浊的世俗社会，以至连姓字都不乐为人所知，但他却是那样深挚地热爱生活，读书，饮酒，与亲旧欢聚；他不慕荣利，忘怀得失，但却具有坚强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，富贵不能夺其志，贫贱不能移其情。他情趣是高尚的，读书是为了探求文章的底蕴，得其旨趣，而不同于仕禄之徒琐琐于章句之间；他著文赋诗，不是为了功利目的，而是抒写心志，有所寄托，借以自娱。这样一种人，显然与那个现实社会是格格不入的，他应属于别一个醇厚美好的世界。“无怀氏之民欤？葛天氏之民欤？”语似悠暇，而意含愤慨。

有人说，文中的“五柳先生”，就是陶渊明其人。如较早的《宋书·隐逸传》云：“潜少有高趣，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。……其自序如此，时人谓之实录。”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相沿此说，后世遂以“五柳先生”作为陶渊明的代称，而以“五柳”代指隐居之处了。

从文章的题目，及其所采取的形式，似乎应归在传记一类。但传记应“编年缀事”“按实而书”（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），而此文并未叙述五柳先生一生行事，甚至连这位先生为何许人、姓字籍贯都不清楚；详其文义，又不象作者故弄玄虚。“五柳先生”的性格特点，有些象是作者本人，不妨看作是作者的自我写照；但以文章的写法，以及“五柳先生”所显示的典型意义而言，把“五柳先生”与作者本人完全等同起来，把这篇文章看作是作者的自叙传，甚或象有的研究者那样字字句句考证、落实下来，就未免太过于拘执了。其实，“五柳先生”是作者用来寄托和抒发自己情志的文学形象，要在抒情，而非纪实。

陶渊明之前，虚拟人物、以“传”名篇的散文，以阮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较有特色。阮文借虚幻的大人先生，对当时的政治，尤其是礼法制度的虚伪，加以嘲讽和抨击。而文多议论，善事铺陈，近于赋体。陶文借自拟的五柳先生，咏写自己高尚的情趣，文体简洁、省净，寓愤激于常语之中。陶文受阮文的影响，而又有独自的风格。如《大人先生传》起首说：“大人先生，盖老人也，不知姓字，陈天地之始，言神农、黄帝之事，昭然也。莫知生年之数，尝居苏门之山，故世咸谓之闲。”这与《五柳先生传》的起首文字何其相似！但阮文带有较多从赋体脱胎的痕迹，多用韵语，而陶文却自然成篇，完全是散文体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五柳先生传》更接近今天所说的“文学散文。”

当然，就内容而言，阮文和陶文都有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的倾向，这是读本文时应注意的。

如果说《五柳先生传》是个人情志的抒发，而其晚年所写的著名作品《桃花源记》，则是他用浪漫主义文笔勾画的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；文章让读者追随着武陵渔人的足迹，走向桃源。未至桃源，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”眼前展现出一幅清新、恬淡的景象。一入桃源，便看到宽阔、平旷的田野，整齐栉比的房舍，清澈的泉池，翠碧的桑竹，是那样开朗、优美！在这里，“阡陌交通，鸡犬之声相闻”，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；”在这里，对人热诚，古朴淳厚，没有营营苟苟的角逐，没有尔虞我诈的争斗，没有压迫，没有剥削，人们相处得都是那样的和谐、自然，一切都充满着人世间的生活情趣！作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，是一幅和平安定、自然淳朴的劳动生活情景。这是一个与动乱、黑暗的现实社会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，作者批判、谴责黑暗现实的用意，是显而易见的。文章没有浓笔重彩的渲染，没有奇特玄妙的夸张，只是平平写来，明白如话，但却令人感受到一种浓郁

的诗意，韵味无穷。朴素自然，而又充满诗情画意，便是《桃花源记》的艺术特色。

这篇文章的内容与形式，也是和谐统一的。桃源社会是在“世外”，即现实社会之外，它是作者社会理想的寄托，情节、人物均系虚构，因而文章写得迷离虚幻；而桃源社会却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“世外仙境”，它是一个人人劳动、自由平等的社会，表现出作者对光明真诚的向往与追求，所以写得又似假若真。你看，有时间，是“晋太元中”；有地点、人物，为“武陵人”。一入桃源，便令人仿佛身临其境，而后再假借“好游山泽，志存遁逸”（《晋书·隐逸传》）的刘子骥加以证实，桃源似乎真的存在，而文中“忘其远近”、“不复得路”云云，其境界又似可望而不可及。文章虚虚实实，曲折尽致，而又承转自然，毫无斧凿痕迹。后人有的会其意，将桃源境界绘为情趣幽深的画图；有的化其境，融铸为意味隽永的诗篇，也正说明这篇优美散文艺术影响的深远。至于本文的思想内容，诸如桃源社会的乌托邦性质等等，人们论之甚详，兹不赘述。

三

陶渊明的另一类散文，便是哀祭文。这类文章，在古代散文中自成一体。刘勰说：“原夫哀辞大体，情主于痛伤，而辞穷乎爱惜。幼未成德，故誉止乎察惠；弱不胜务，故悼加乎肤色。隐心而结文则事惬，观文而属心则体奢。奢体为辞，则虽丽不哀；必使情往会悲，文来引泣，乃其贵耳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哀吊》）陶渊明的祭文，便是“情往会悲，文来引泣”的至情之文。

陶渊明的祭文，分两类：一是祭悼亲人之文，如《祭程氏妹文》、《祭从弟敬远文》，一是《自祭文》。祭悼亲人，痛伤乃人情之常。而形诸文墨，抒写悲痛，却并非易事。陶文的动人处，在于至情之言，从叙其生平琐事絮絮道出。程氏是渊明的异母妹，其母早逝，兄妹幼年相依，感情特别深厚。渊明在彭泽任上，惊悉程氏死讯，即骏奔赴吊（见《归去来兮辞序》），一周年后写了这篇哀切动人的祭文。“寥寥空室”，写其人去室空的怅惘之情，“哀哀遗孤”，是触其哀思的情由；伫立空室，手抚遗孤，自然浮现出兄妹孤苦相依的情景。程氏生前“乖隔楚越”，不得聚首，死后奔丧，未得诀别，留下终生的憾恨！其悲痛之情，直可感天动地：“黯黯高云，萧萧冬月，白雪掩晨，长风悲节。”高天之云为之暗淡，明月之光为之凄哀；白雪以致哀悼之情，长风悲号以示悼惜之意。痛极无言，只有崩角号哭，以至呼出“死如有知，相见蒿里”了。

同是手足同胞，从弟敬远与程氏不同。与程氏主要是“特日常情”的兄妹情谊，而与敬远则不唯手足，且是志同道合的知己。因此，《祭从弟敬远文》是在追叙敬远的品德表现的同时，抒发其痛悼之情。渊明追述自己归隐之后，人或非议，而敬远“常愿携手，置彼众议”，给予同情和支持。这在当时是令人铭刻难忘的。而其所以如此，是因其“有操有概”，“少思寡欲，靡执靡介。后己先人，临财思惠。心遗得失，情不依世。”因此，渊明“感平生之游处，悲一往之不返。”以至“情恻恻以摧心，泪泫泫而盈限。”读此文，直如倾听作者哀哀切切的诉说，欲与作者同声一哭。

《自祭文》别具一格，为渊明所独创。文中标明“岁惟丁卯，律中无射”，即丁卯年九

月，亦即宋文帝元嘉四年（427）九月。两月后，陶渊明就与世长辞了。就是说，他病卧在床，于濒危之际，为自己预写祭文。为自己先设预祭，已出人情之常，自己祭悼自己，属文何以措辞？一般祭文自然要悲其死，颂其德。然自陶渊明看来，个人生死为一种自然现象，“有生必有死，早终非命促”（《拟挽歌辞三首》之一），“应尽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”（《形影神》）至于“德”，似乎应让后人评价，自己不好说的。他所祭悼的不是自己的死，而是自己艰难而磊落的一生：“自余为人，逢运之贫，簞瓢屡罄，絺绤冬陈。含歌谷汲，行歌负薪，翳翳柴门，事我宵晨。春秋代谢，有务中园，载耘载耜，乃育乃繁。欣以素牍，和以七弦。冬曝其日，夏濯其泉。勤靡余劳，心有常闲。乐天委分，以至百年。”幼而孤苦无依，长而清正自守；辞官隐居，躬耕为乐，三生清白，从老得终。自然而然，自然而去，平平叙来，似无不平，亦无感慨。然而，渊明并不如此超然，也并不如人们推许的那么旷达。终生不遇，死而认命，不能不说是消极的，然而，在“乐天委命”“识运知命”的消极话语里，你可隐约感到他其道不行、无可如何的痛苦；“人生实难，死为之何”更是直抒感慨，对那个黑暗的时代提出的最后抗议。只是寓愤激于常语之中，深沉的痛苦隐蔽于旷达的文词内边，令人难觉耳。因此，他为自己预写祭文，不是因为活得无聊，游戏文字，而是通过叙述自己的一生，引发后人的思考。这也正是他对人生执着的另一种表现。祭其死，悼其生，寓愤慨于常语，正是这篇自祭文的写作特点。

刘勰论述哀吊文的发展，从贾谊《吊屈原赋》论及魏晋云：“祢衡之吊平子，缛丽而轻清；陆机之吊魏武，序巧而文繁。降斯以下，未有可称者矣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哀吊》）这一说法，并不公允。祢衡之吊张衡，陆机之吊魏武，文虽缛丽，情则不足，均系有意为文者；陶渊明之祭手足，情真意切，盖因发自肺腑。而祭文，要在以文达情，而非以文饰情。因此，魏晋以降，陶渊明之祭文有足称者。

四

陶集中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》，是陶渊明为其外祖父孟嘉写的传记。自云：“凯风寒泉之思，实钟厥心，谨按采行事，撰为此传。”是因忆念亡母，追思外祖父的行事，写了这篇传记。其态度是严谨的，“惧或乖谬，有亏君子之德”，是“按实而书”的。同时，因其对外祖父的为人十分崇敬，在传述中自然倾注进自己的感情。

这篇传记在写法上，遵循一般传记体例，但行文中显然可见《史记》的影响。作者没有平叙孟嘉的生平事迹，而是选择他一生中最能表现其品格的几件事，加以具体生动的传述。如孟嘉从仕之初，被江州刺史庾亮用为庐陵从事。“下郡还，亮引见，问风俗得失。对曰：‘嘉不知，还传当问从吏。’亮以麈尾掩口而笑。从事既去，唤弟翼语之曰：‘孟嘉故是盛德人也。’君既辞出外，自除吏名，便步归家。母在堂，兄弟共相欢乐，怡怡如也。”表现出孟嘉不奉迎取媚、敝履仕途的清高品格。再如，孟嘉做桓温参军时，有落帽著文的逸事。“九月九日，温游龙山，参佐毕集……时佐吏并著戎服。有风吹君帽堕落，……君初不自觉，良久如厕。温命取以还之，廷尉太原孙盛为谏议参军，时在坐，温命纸笔嘲之，文成示温，温以著坐处。君归，见嘲笑而请笔作答，了不容思，文辞超卓，四座叹之。”表现出孟

嘉洒脱不拘的仪度和敏捷的才思。其他,如与“辞荣不仕”的许询一见倾心,“雅相知得”,“好酣饮”而深得“酒中趣”,以及“任怀得意,飘然远寄,傍若无人”等等,都从不同侧面写孟嘉异乎常人的品行。在传述中,作者有时便情不自禁地插入赞评,然均非一般谀颂文字。从对孟嘉的传述中,可见陶渊明深受其外祖父的影响;孟嘉那酣饮不拘的风度,冲默淡远的品格,“行不苟合,言无夸矜,未尝有喜愠之容”的表现,都俨然是陶渊明的自叙自评。因此,陶渊明对其外祖父的崇敬与赞颂,就是可以理解的了。

《与子俨等疏》,是陶渊明晚年戒谕儿辈的一篇文章。这类文章,自两汉以来是很多的。最著名的是东汉马援的《诫兄子书》和郑玄的《戒子益恩书》。马文诫其侄谨言慎行,以远祸避害,反映了一个封建将军鉴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而产生的戒惧心情;郑玄则望其子承其“德业”,“勗求君子之道,表现出经学家以德业自诩的处世态度。两文内容多为封建说教,行文恳切周至而类多平直。而陶文却不然。文章大部分不是告诫儿辈如何做,而是说他自己的心情和处世态度。在自叙生平行事一点上,与郑玄文有些相似,但陶文的叙述却不同于郑文的平直,而是通过叙写自己的情趣说明自己的崇尚与追求:“少学琴书,偶爱闲静,开卷有得,便欣然忘食。见树木交荫,时鸟变声,亦复欢然有喜。常言五六月中,北窗下卧,遇凉风暂至,自谓是羲皇上人。”即是说,他从先哲的著述中受到启迪,在自然的美景中受到陶冶,远离恶浊的现实,追求淳真的境界,虽然清苦,亦乐在其中。这是一个“性刚才拙,与物多忤”的下层文人的自白,意在告诫儿辈在恶浊的现实中处贫守贱、砥砺名节。无一语训戒,而训戒自在其中。即使文章后半以古人为例告诫儿辈要友爱相处,情意恳恳,略表期望,也毫无呆板训诫之感。自叙如诗,情貌可见,率意写来,无复矫饰,这正是陶渊明戒子文的可贵之处。自然,从今天看来,他所追求的闲静自得的生活境界并不可取,而在当时这种高洁自守的品格不无积极意义。

五

陶集中述、赞,即论赞,是以韵文写出的史论一类文字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或为序目,或为后评,就是这类文字的发端。所以刘勰说:“迁史固书,托赞褒贬,约文以总录,颂体以论辞。”“纪传后评,亦同其名。”其文“促而不广,必结言于四字之句,盘桓乎数韵之辞,约举以尽情,昭灼以送文”(《文心雕龙·颂赞》),是一种句式整齐、大体押韵、篇幅短小、词约意显的文字。据陶渊明自注,《读史述九章》就是类似“纪传后评”的史评。所不同者,陶文非为全面评述其人一生行迹,而是借史抒慨,别有寄托。如苏轼云:“渊明作《述史九章》,《夷齐》、《箕子》,盖有感而云,去之五百余载,吾犹知其意也。”(《书渊明〈述史九章〉后》)因此,在写法上作者只撮取其人的某一方面加以引发,都有其现实针对性:夷齐的让国高蹈,箕子的易代之悲,盖刺当时篡弑相继、内乱迭起的黑暗政治;管鲍、程杵,则是颂赞真诚友谊而隐讽世态的浇薄;慨屈贾、韩非、张长公的不遇其时,其实是夫子自慨,而赞美鲁二儒的刚介贞正,则是表示对迷变应时、钻营求媚一流人的蔑弃。

《扇上画赞》、《尚长禽庆赞》二文,与史评相类,其所赞颂的,都是历史上隐居不仕或

逃禄归耕的人物，他们厌恶世俗丑恶“有时而隐”的政治态度，“耦耕自欣”“寄心清尚”以躬耕为乐的情趣，毋宁说都是陶渊明自身的生动写照。因此，与其说是赞词，不如说是情深辞美的四言诗。

总之，无论述、赞，陶渊明都不蹈袭前人，而是据其所要表述的内容自创体式，精思逸韵，有可取者。但述、赞作为史评，全用韵文则有一定局限。

六

综上所述，陶渊明的散文，是感发于中，情不能已而后发，而非矫情之作。阅尽污浊现实，而有桃源理想的追求，愤世嫉俗，始以“五柳”表明自己的节操；悼妹怜其遗孤，祭弟思其为人，不假藻饰，率意写来，自能感人肺腑。因此，“为情造文”“情至文生”，是陶文的第一个特点。

陶文的第二个特点，是语言的清新朴素，富有艺术表现力。陶文洗尽铅华不尚藻饰，然小河流水一经点染即是佳景，花草林木一入文章便充满诗意；阡陌纵横如画，鸡鸣狗叫如闻，令人仿佛身临其境。训儿辈恳恳切切，平易可亲；叙自己毫不矫饰，状貌如现。其散文作品，行文如行云流水，读来清新流畅，而又意味隽永，令人百读不厌。

“学非称师，文取指达”（颜延之《陶征士诔》），是陶渊明散文的突出特点。钟嵘论陶诗，说“其源出自应璩，又协左思风力”（《诗品》），确当与否，姑置勿论，其文却很难指定影响所自。《桃花源记》的构思，或有庄子寓言的影响，《五柳先生传》可能受到阮籍文的启示；传状疏祭诸文体，体式各有取法，而写法则出自己意。可见，陶渊明既善于将前代艺术成就熔于一炉，又依情铸文，富有独创精神。

“每观其文，想其人德。”（钟嵘《诗品》）陶渊明散文是其品格、志趣的艺术体现。陶渊明“欲有为而不能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愤而归隐，而在归隐之后，“虽偃蹇不欲与世接，然犹未平其心”（韩愈《送王秀才序》），因而陶渊明抒情言志之文出语平淡浑璞，而用心常深隐高远。其为人作文，都与士族社会相迳庭。因此，当士族文人把持的文坛由玄言渐渐转向形式主义之时，陶渊明却能独自保持着淳朴自然、清新淡远的艺术风采。

散文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，它的成就甚至可以和诗歌相媲美。它也如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，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。先秦诸子，左传、国策，西汉班、马，贾谊、晁错，他们都以独自的艺术风采彪炳千代。然先秦两汉的散文，或阐明某一道理，或叙述某一史实，于论议与叙述之中，运用了某些文学手段，使文章生动、形象，引人入胜。而发展到魏晋时代，随着文学批评的发展，文、史、哲的分界渐趋明显，散文创作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。陶渊明散文数量不多，但却代表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成就。在陶之前，史传散文和政论散文是散文创作的主体，而自陶之后，记事抒情散文便逐渐得到重视和发展。就此而言，陶渊明的散文对散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